



## 杜光教授序

### 一座民主运动的历史丰碑——《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》序言

#### (一)

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，1957年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。在这一年里，阴差阳错地被挑起的民主运动，和阴谋阳谋混合叠加的反右运动，相继出现于中华大地，在历史上刻画下既辉煌又悲惨的印记，也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创伤。这一年的历史是不堪回首的痛史。

历史的逻辑告诉我们，任何灾难和创伤，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，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。问题在于如何反思总结，吸取教训。如果拒绝反思总结，拒绝吸取应有的教训，那么，不仅这些难得的精神财富会化为乌有，而且，那些导致灾难的因素，还有可能卷土重来，给社会造成新的创伤。

1957年的民主运动和反右运动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训，值得总结记取。遗憾的是，它至今仍被束缚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——反右运动是必要的、正确的，只是扩大化了。几十年来，反右运动已成为不许妄议的敏感话题，官方媒体噤若寒蝉，民间关于这段历史的著作、回忆录、论文集，一概不许出版，侥幸出版的也不许发行。至于前期的民主运动，更罕有人认识，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就更谈不上了。

尽管如此，民间自费印刷、揭示这段历史真相的回忆录、专著、论文集却不断突破禁令而层出不穷，为复原民主运动和反右运动的真实面貌，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，提供了丰富的个案资料和宏观视野。最为难得的，是香港有一个以研究1957年的历史为主旨的“五七学社”。他们成立以来，广泛搜集有关资料，辑印成书，并且出版了100多部在内地无法出版的著作。近几年来，他们在长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，编就一部上千万字的《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》。这部巨著收录了三万余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受难者的姓名和简况，列名其上的，是民主运动的参加者，也是反右运动的被害者。它既是记录民主运动的历史波涛的功劳簿，也是揭露反右运动的滔天罪恶的罪行录。它不仅为五七痛史提供

丰富而扎实的基本资料，而且成为让后人认识并铭记发生在那一年的历史事件的生动教材。

## （二）

1957年的历史，以《人民日报》6月8日的社论《这是为什么？》为界，可以作出明确的划分。“六八社论”之前是风起云涌、遍及全国的民主运动，是广大民众挑战、讨伐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革命；官方的说法则是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行为。“六八社论”之后在全国迅速铺开的反右运动，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者对民主运动的疯狂反扑和残酷镇压；官方的说法是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，是政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。

“六八社论”之前的民主运动，是一场远未成熟、因而流产的革命运动，诱使它不适时宜地出现的因素很多，主要是：

1、土改、镇反、肃反等运动中许多过于粗暴、甚至是残暴的做法，扩大了打击面，伤害了许多无辜者；在文教界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，则是对知识分子的严重的精神戕害。这些措施，造成一些社会群体对新政权的离心倾向。

2、对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“社会主义改造”，剥夺了农民、手工业者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。在敲锣打鼓的欢庆声里，隐藏着丧失私有财产的无奈与不满。随着“三大改造”而来的统购统销，更是剥夺了民众赖以生存的取得衣食的自由权利，引起普遍的失望与愤怒。

3、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提出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，给人们造成政治管制有所宽松、社会自由度有所扩大的错觉。费孝通发表的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》一文，典型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对形势的虽然不无顾虑、却又过于乐观的误判。

4、国际上出现的动态，如1956年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骚动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，对国内的知识界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。

5、除以上诸因素外，促使民主运动远未成熟就贸然启动的最直接的诱因，是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。为了贯彻这个指示，各级各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出动，号召、动员甚至逼迫人们揭发批判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存在的主观主义、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，“帮助党整风”。许多人或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与动员，提出一些批评建议，或是被迫勉为其难地参加会议，临场敷衍几句，结果都落入阴谋阳谋的圈套，不幸罹难。

这场在“帮助党整风”的号召下，由共产党推动的群众运动，主题是揭发批判官僚主义、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。但这“三害”本是专制主义官僚机构的特产，人们揭发批判“三害”，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，虽然主观上并没有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意愿，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组织联系，但就其实质来说，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独裁专制，呼求民主自由，带有浓淡不一的民主主义色彩。可以说，这是一场被动的、不自觉的民主运动，带有很大的改良主义成分。

## （三）

这场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是十分庞杂的。应该承认，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

罹难者，大多数没有出于理性的自觉的民主要求。走在运动前列、足以代表这场群众运动之民主主义性质的，是处于少数的三类知识分子。

第一类是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。他们身处知识的海洋，吸纳自由民主的现代理念，对社会的现实问题最为敏感，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怀有真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当之无愧地成为那场民主运动的先锋。这个先锋群体，可以北京大学的“五一九运动”为代表。

把北大学生当年的民主运动称为“五一九运动”，源于有些北大学生在5月19日这一天贴出几张大字报小字报，有的要求“开辟民主论坛，确保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示威的民主权利”；有的针对全国团代表大会代表未经选举，抗议剥夺广大团员的民主权利；最激动人心的是沈泽宜、张元勋的长诗《是时候了》。它宣称“我的诗/是一支火炬”，“它的火种来自——五四”“歌唱真理的兄弟们/快将火炬举起”，“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”！

这些大字报小字报挑起了青年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激情。当天晚上，宿舍里灯火通明，许多学生彻夜未眠，讨论着，争辩着，商榷写大字报的内容。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多，校园里已经有162张大字报，接连几天，大字报贴遍全校，数以千计。这些大字报洋溢着感性的热烈呼求，也饱含着理性的冷静分析，其主旋律就是民主自由。如谭天荣在《几句人情话》里高呼：“自由、民主、理性万岁！”燕遯符的大字报宣称：“我们再次举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帜战斗！”王国乡表示：“争取真正的人民自由民主。”严仲强提出：“为了真理、人道、民主、自由，我可以牺牲一切。”钱如平誓言：“头可断，血可流，真理决不能丢”。有些大字报分析官僚主义、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的根源，指出：“三害”同苏联的错误和波匈事件一样，“都是一个根源：不民主。”（岑超南）“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，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。”（张锡锬）“高度集权是危险的。”

（王书瑶）“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，民主是人民自己的。”（刘奇第）有的还直指共产党是“宗派主义的鼻祖，官僚主义的根基。”（蒋兴仁）

和大字报同时展开、相得益彰的，还有一些辩论会、控诉会。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先后在23、27两日应邀到北大讲话，就无产阶级专政、个人崇拜、胡风问题、肃反扩大化、人民内部矛盾、统治阶级局限性、社会主义阴暗面、权大还是法大等问题，进行了深刻的评论与尖锐的批判。在这些会上，有的学生控诉公安部门滥施酷刑、刑讯逼供；有的揭露北大在1955年肃反时批斗二百多名学生，私设公堂，非法审讯，激起学生公愤。

除此之外，学生们还建立组织（如“百花学社”），出版刊物（如《广场》、《自由论坛》），派人到其他学校宣传发动，到北京市委请愿，到《人民日报》抗议，很快就在北京以至全国的高等学校，掀起民主运动的高潮。

从5月19日到6月8日，短短的20天里，如火如荼地席卷北大全校的“五一九运动”，内容之广泛，形式之丰富，批判之深刻，都体现出反封建、反专制，争民主、争自由的民主主义特质，成为1957年那场全国性民主运动的典范。钱理群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指出：“北京大学的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与

发展，在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”

#### （四）

第二类是民主党派成员和大学教授、专家、学者。这些高级知识分子，都曾在国内或国外接受高等教育，有比较深厚的民主主义素质。他们多数曾经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，为共产党的“建立一个独立、自由、民主、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”的号召所吸引。因此，对新政权的一些违背当初诺言、违反自由民主原则的做法，有所不满，有所批评。“帮助党整风”的号召，给他们提供了表达不满的机会。

这个群体当年提出的批评建议，总的说来是相当温和的，一般也比较含蓄，但反对专制的民主主义意愿，还是十分明显的。如章伯钧的“政治设计院”，反映了希望民主党派能更多地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意愿。储安平的“党天下”，则是对一党专政的批判。罗隆基的“平反委员会”，主张平反一切冤假错案，这等于是揭露专制统治的罪恶；他还指出“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”，更表现出对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不满。

大学教授的民主要求，主要集中在和高等教育有关的问题上。自从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以后，各大学的教授已如“惊弓之鸟”，虽然心怀不满，却也只能俯首帖耳，龟勉从事。“帮助党整风”的阳谋，挑起了他们心头的积怨。于是，有些比较大胆的教授就脱颖而出，在一些座谈会上，有的慷慨陈言，淋漓尽致，有的隐晦含蓄，点到为止。话题集中在党群关系、知识分子政策、民主办校、非党干部有职无权等问题上。如北京师范大学黄药眠指斥学校党委“以党代政、党政不分”，共产党员“党气凌人”，把知识分子看成“漆黑一团”，是“异己分子”。朱智贤批评师大党委“无知”、“外行”，“但又有绝对决定权”。陶大镛、钟敬文、董渭川等都提出民主党派的作用发挥不够。这些意见虽然针对的是北师大党委，但都具有普遍的意义。曾昭抡等起草的《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》，黄药眠等提出的《我们对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》，更是从教育和科学的角度，委婉地表达出反对专制统治、呼求民主政治的意愿。

在五七民主运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，还有一个因坚持民主主义观念而不幸罹难的群体，那就是法律界的专家学者。由于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特点，许多法律界的专家以至官员，都主张司法独立、无罪推定等现代法学理论。这些同专制统治对峙的思想观点，构成那场民主运动的重要内容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法律界成为反右运动遭到整体性残酷镇压的重灾区。

#### （五）

第三类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干部，特别是一些身居一定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。这些党员多数经过延安整风运动，具有多年工作经验，对共产党的运作方式有较深的体认，所以比起党外人士，更能一针见血地击中要害。以当年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一些司局厅级干部为例，他们在整风中所提出的大量批评建议，遍及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许多领域，从土改、镇反、肃反、三反五反、思想改造、高校领导制度，到合作化、三大改造、统购统销、反胡风、知识分子

政策、工业化冒进，以至党内生活、工作作风、领导干部特殊化等等，批判无不涉及。对于社会上热火朝天、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，也有许多人表示认同。如有的认为“北大、清华大字报里的意见都可以考虑。”（萧鲁）“林希翎、谭天荣的意见不错，也许万年之后会成为香花。”（王谭）“过去我们打人家十下，现在人家打我们一下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！”（张生强）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党内生活的揭露与批判，为其他群体所不及。如有的批评“党内不民主，整下不整上。”（王文良）“党内就是你搞我，我搞你。”（刘汉仁）“党中央缺少自我批评。”（刘德焜、石天行）“中央政策左右摇摆，工作或左或右。”（王善玲）“中央的指示和党报社论都是老一套。”（盛坚夫）“只要能体会领导意图，能拍马屁的干部，都能提升；敢于独立思考、认真工作、积极负责的干部往往受打击。”（高朗）“党内有些领导干部和下级的关系是主奴关系。”（方德）在小组会和平日闲谈时，还不乏对毛泽东的批评，认为他主观片面，独断专行，好大喜功，缺乏自我批评精神。

共产党内的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所提出的批评建议，触及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。这些工作中的失误和存在的弊病，探究总的根源，都同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有关，反映出他们对独裁专制的不满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求。共产党内的这股健康力量，是后来的党内民主派的前驱。

#### （六）

1957年的这场早产的民主运动，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。它之所以宝贵，不仅因为它包含者无比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供后人吸取，还因为当年这些民主运动的先驱者所揭露批判的专制统治，今日依然充溢于整个社会，而且专制主义的罗网日益繁密，对社会的管制更加严酷，而争取民主自由的呼声却渐趋式微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，本质上无异于民主先辈们面对的1957年，甚至比那个年代更严重，更专制化。当年镇压民主运动所带来的道德沦丧、诚信湮灭，至今没有消除。民主先辈的呼声和追求，当前有着切实的、甚至更为切实的意义。《右派分子名录》以收录数以万计名五七民主战士的方式，默默地昭告社会：毋忘五七，毋忘民主先辈尚未实现的反独裁反专制、争民主争自由的宏伟目标。他们的民主主义思想，有待后人继承发扬；他们未竟的事业，有待后人接续完成。所以，《右派分子名录》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，远远超过一部资料性的著作。它是一座民主运动的历史丰碑，记录着民主先辈反专制的勋绩，揭露着专制统治者镇压民主运动的罪行。它是长鸣的警钟，时时刻刻在警告我们：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！”

向1957年的所有民主战士和罹难烈士致敬！

2019年4月3日

【杜光出生于1928年，在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室副科长任上被打成右派分子，被劳动改造二十年，1979年回中央党校，先后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、科研办公室主任兼图书馆馆长。1989年因支持学生运动，被撤消中共党内外一切职

务。著作有《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》、《为“自由化”正名》、《1957 年的革命和反革命》、《杜光文存》等。]